

教育强国建设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育人体系：理论机理、现实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

何咏思¹ 向星² 简钰清^{2,*}

(1.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2.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复合型人才供给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当前本科教育规模扩张与岗位胜任力要求错位的矛盾日益凸显,“本升专”“反向技能升学”等现象折射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供给侧短板。本文跳出“学术/职业”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依托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理论、能力本位教育框架与产教融合协同理论,系统阐释应用型本科高校推进复合式培养的内在理论逻辑,结合全国多所行业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调研数据,从培养范式、评价体系、治理机制三大维度剖析当前人才培养领域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普教逻辑”路径依赖,知识与能力脱嵌、学历与证书断裂问题未得到根本性破解。基于此,本文以体系化制度创新为核心,从分类定位治理框架搭建、“学习成果—能力框架—行业标准”三位一体认证体系构建、“课程—实践—研究”一体化教学重构、长周期岗位实践制度化落地、协同治理生态培育五大维度,提出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路径,为应用型本科高校锚定差异化发展赛道、提升区域产业服务能力、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 教育强国; 应用型本科高校; 复合式培养; 人才培养体系; 高等教育分类治理; 产教融合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mpound Train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Supply for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and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Yongsi He¹ Xing Xiang² Yuqing Jia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510642)

Abstract: The supply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s key to foster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solving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employment. At present,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expans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and job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has become

【作者简介】何咏思,女,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经济学院,讲师,heyongsi@szpu.edu.cn;向星,男,研究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458083506@qq.com;简钰清,女,博士,副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jianyq@scau.edu.cn,通讯作者。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henomena such as "undergraduates pursuing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and "reverse skill-oriented further education" reflect supply-side shortcomings in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theories of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framework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synergy theory to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 the internal theoretical logic of implementi

ng 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multiple industry-featured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practical dilemmas in talent train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training paradigm, evaluation system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generally suffer from path dependence on "general education logic" d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fundamental solutions are yet to be achieved for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s well a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academic degrees and vocational certificates. Accordingly, focusing on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rom five dimensions: establishing a classified positioning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constructing a trinity certification system of "learning outcomes-competency framework-industry standards", reconstructing integrated teaching of "curriculum-practice-research", institutionalizing long-term on-the-job practice, and foster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cosystem.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o identify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paths, improve service capacity for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support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Keywords: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 talent training system;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首次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将高等教育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标志着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正式进入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的全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

动应用型本科高校聚焦区域产业需求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将复合式人才供给提升至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高度。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2023年的60.2%升至2024年的约60.8%，2025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攀升至1222万人，“学历红利”逐步消退，用人单位的评价逻辑全面转向实际岗位胜任力。然而，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仍延续学术型办学路径，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未形成差异化特色，导致人才培养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产生明显错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7月我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17.8%，而智联招聘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届大专生就业率达56.6%，高于本科毕业生45.4%，这种就业市场的倒挂现象暴露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性短板。与此同时，“本升专”“反向升学”等新态势逐步显现：经过对粤港澳大湾区6所涵盖师范类、农林类、工科类、语言类的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调研估算，2024级新生中有34%曾考虑报考职业本科；2025年毕业季，已有52%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主动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或报读技能培训班，这一系列现象倒逼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革。

学界围绕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已经展开了长期探索，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一方面，充分论证了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必要性，指出应用型本科是连接研究型高校基础创新与技能型高校一线技能落地的关键枢纽，承担着培养兼具跨学科知识储备与实践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核心使命。另一方面，从产教融合、课程改革、师资建设等维度提出了具体的优化路径，部分试点高校已形成初步实践经验。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多数研究未跳出学术与职业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尚未构建起适配中国国情的复合式培养理论框架，对复合式培养的内涵边界、核心维度、运行机制的学理阐释不够系统；二是现有对策建议多聚焦局部环节的调整，尚未形成覆盖分类定位、标准体系、教学重构、实践落地、生态培育的全链条制度创新方案，难以支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性重构。基于此，本文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既从服务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战略高度系统阐释复合式培养的内在理论逻辑，又依托一手调研数据深入剖析现实困境，最终勾勒出复合式培养体系的完整重构路径，为《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落地实施、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的实践参考。

二、复合式培养驱动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质量升级的理论逻辑

学者别敦荣（2022）研究发现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中间层级，既区别于研究型高校以知识原创为核心的育人定位，也不同于技能型高校以一线技能养成为核心的培养模式，其核

心价值在于搭建“理论知识—技术应用—工艺创新”的转化桥梁，复合式培养是实现这一核心价值的路径。本部分依托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理论、能力本位教育理论、协同创新理论三大核心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复合式培养驱动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性升级的内在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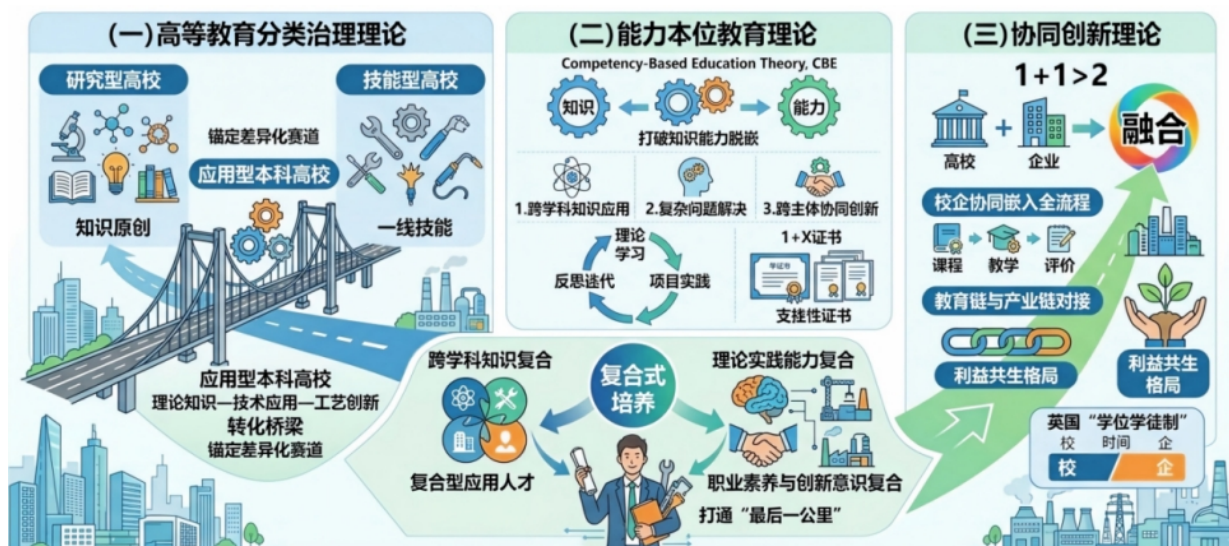


图1 复合式培养驱动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性升级的内在机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一) 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理论：复合式培养是应用型高校锚定差异化赛道的核心依据

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的核心要义是厘清不同院校的组织功能边界，依托类型学理论将不同高校的办学使命与社会需求精准匹配，避免同质化竞争导致的教育资源低效配置。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普遍存在定位模糊的问题：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在发展过程中盲目向学术型大学靠拢，将考研升学率、纵向科研课题数量、核心论文发表量作为核心办学指标，反而丢失了服务区域产业、对接行业需求的核心特色。潘懋元（2005）曾论及应用型高校的定位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应用型本科在人才市场上陷入“理论深度拼不过研究型大学、实操能力比不过职业院校”的尴尬境地。复合式培养的核心价值为应用型本科明确了专属的类型化育人使命：它既不片面追求纯学术的知识原创，也不局限于单一岗位的操作技能训练，而是以跨学科知识复合、理论实践能力复合、职业素养与创新意识复合为核心，面向区域产业集群的中高端岗位需求，培养能够解决复杂生产场景下综合问题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这种定位契合波特高级生产要素理论的核心逻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既需要顶尖的基础研究人才，也需要大量的一线操作人才，而能够打通基础研究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完成工艺改良与技术中试的复合型人才，是当前产业生态中最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这类人才无法依靠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训练产出，也难以通过技能型高校的单一技能培养实现，只能

由应用型本科高校依托复合式培养体系定向供给。

国际经验验证了这一逻辑：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明确将复合式能力培养作为核心办学目标，通过校企双元协同的培养模式，使毕业生既具备系统的理论知识储备，也拥有完整的岗位实践经验，71%的毕业生直接进入合作企业留用，成为德国工业 4.0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人才支撑（徐理勤和王兆义，2023）；新加坡整合式工学交替计划（Integrated Work Study Programme, IWS），要求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学科知识与岗位能力的深度复合，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全周期真实项目训练，岗位适配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 60%以上。这类国际经验充分证明，复合式培养是应用型高校锚定差异化类型定位、构建不可替代核心竞争力的根本路径。

（二）能力本位教育理论：复合式培养是破解知识能力脱嵌矛盾的核心抓手

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CBE）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中后期的职业教育改革浪潮（Spady, 1977），其核心要义是打破传统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育人逻辑，将岗位胜任力作为人才培养体系设计的核心出发点，实现知识体系与能力体系的双向对应。传统本科教育长期遵循学科导向的培养逻辑，课程设置按照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排布，学习过程以被动接受理论知识为主，评价标准以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为核心，最终导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学生掌握了大量抽象理论，不知道如何在真实生产场景中应用，造成知识与能力的严重脱嵌。

复合式培养对传统培养模式的革新体现为对能力本位教育理论的系统性落地：它将岗位胜任力拆解为跨学科知识应用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跨主体协同创新能力三大核心维度，以此反向重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评价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从知识输入导向转向能力产出导向。从能力形成的学理逻辑看，复合型能力的生成无法通过碎片化的理论学习实现，必须依托“理论学习—项目实践—反思迭代”的完整闭环过程：学生在真实产业场景中接触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调用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在反复试错中完成知识的内化与能力的升级，最终形成能够适配动态岗位需求的复合胜任力。

（三）协同创新理论：复合式培养是实现产教深度融合的核心纽带

Etzkowitz 和 Leydesdorff（2000）指出，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路径，不同属性创新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可实现协同增效效应，提升创新效率与育人质量。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路径，协同创新理论指出，不同属性创新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可实现“1+1>2”的协同效应，提升创新效率与育人质量。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普遍浮于表面：多数校企合作停留在浅层次，企业未实质性参与人才培养核

心环节，无法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复合能力。

复合式培养体系从顶层设计将校企协同嵌入人才培养全流程：一方面，行业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所有核心环节，将产业需求转化为育人要素，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另一方面，高校智力资源向企业开放，师生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帮助解决实际难题，最终形成利益共生格局，破解传统产教融合动力不足、深度不够的痛点。英国“学位学徒制”是这一理论的典型落地。陶莉、张家飞与 郝明东（2024）指出高校与企业共同设计培养方案，学生一半时间在校学习、一半时间在企业工作，毕业时同时获得学位证书和岗位所需复合能力，实现三方共赢，为我国应用型本科推进复合式培养提供了实践参照。

粤港澳大湾区已有同类探索初具雏形：深圳理工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科教资源，探索“三院一体”（学院、研究院、书院）协同育人模式，独创“4+1+3”培养方案，将科研实践前置至大学一年级。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布局港澳合作办学新形态：2025年12月成立的大湾区大学，实行“大一不分专业、大二自由选择”培养模式，为学生配备学术导师和大湾区头部企业导师，将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资源纳入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布局物质科学、先进工程、信息科学等方向。这些实践为我国应用型本科推进复合式培养提供了先行经验。

三、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复合式培养推进过程中的现实困境

依托对全国27所不同类型行业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地调研，结合2023-2025年的公开统计数据，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探索复合式培养的实践过程中，受办学路径依赖、制度供给不足、资源配置偏差等多重因素制约，存在三大类共九个维度的突出困境，严重制约人才培养质量的升级。

（一）培养范式层面：“普教逻辑”路径依赖难以破除，复合式育人理念尚未形成体系化共识

当前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已经意识到转型的必要性，但办学实践中仍然延续学术导向逻辑，复合式培养停留在口号层面，未触及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环节改革。

第一，办学理念转型浮于表面，形式化转型替代实质性改革。不少地方应用型高校仅停留在更改院校名称、新增热门专业的表层操作，并未对课程体系、师资结构、评价机制进行根本性调整，办学定位与学术型高校高度趋同，将学科建设、课题申报、论文发表作为核心考核指标，面向区域产业的复合能力培育被置于边缘位置。调研结果显示，68%的受访应用型高校将国家级纵向课题数量、CSSCI论文发表数作为核心权重指标，仅有12%将“企业技术服务项目到账经费”“学生参与

真实产业项目数量”纳入核心办学考核体系。这种评价导向直接引导院校资源向学术研究倾斜，用于复合式实践教学投入长期不足。

第二，课程体系学科化倾向明显，实践性教学环节严重缺位。多数院校仍按传统学科逻辑设置课程，理论课程占比偏高，实践教学、项目化教学占比被压缩。调研显示，近七成应用型本科高校理论课程占总课时比重超70%，剩余实践教学多为浅层的“观摩一见习”，各类专业实训时长普遍不足8周，且安排碎片化，缺乏长周期任务驱动的完整真实岗位锻炼，无法培育学生跨场景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导致培养的人才理论不深与实操不强，难以满足岗位复合能力要求。

第三，师资队伍能力结构错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短板突出。一方面，应用型高校教师引进沿袭学术型大学招聘标准，要求博士学位、高水平科研成果，多数新任青年教师无行业一线工作经验，无法胜任复合式实践教学。调研显示，受访27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具有5年以上行业一线全职工作经历的专业教师占比平均不足15%，远低于职业院校。另一方面，现有教师评价向学术成果倾斜，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开展技术服务无法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中获得对等认可，导致教师进入产业一线锻炼动力不足，师资能力结构与复合式培养要求严重错配。

（二）评价体系层面：能力认定机制割裂，“知识—能力—认证”联动链条尚未打通

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的人才评价体系仍延续传统单一学术评价逻辑，学历体系与职业资格体系深度割裂，学生复合能力难以得到有效认证与市场认可。

第一，学生评价脱离真实生产场景，评价结果无法反映复合胜任力水平。现行高校学生学业评价仍以校内闭卷笔试、模拟实验考核为核心，考核偏向书本理论记忆，极少将企业真实工况下的任务完成质量、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纳入评价指标。这种模式下的高分学生往往应试能力强，不具备岗位所需实操能力，导致企业对院校培养人才信任度不足。某珠三角智能制造行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在调研中表示，不少应用型本科毕业生专业课程分数在90分以上，但基础设备调试操作都需从头教起，达不到岗位能力预期。

第二，校企合作重数量轻质量，实践培养环节内卷化问题突出。不少院校为完成教学考核指标，批量与企业签订名义合作协议，合作企业数量多，但绝大多数合作停留在纸面，没有实质性育人协同内容。企业出于控制人力成本考虑，往往将实习学生视作廉价辅助劳动力，仅安排边缘性辅助工作，不开放核心工艺项目参与权限。依据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2018），复合能力成长需要深度参与完整生产项目流程，当前学生长期处于实践共同体边缘，无法参与核心环节，难以形成完整复合能力体系，最终形成“校企合作协议越来越多，学生实操能力提升越来越慢”的内卷闭环。

（三）治理机制层面：分类制度供给缺位，复合式培养的外部支撑生态尚未完善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层面，针对应用型本科的分类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复合式培养推进所需的政策协同、资源配置、社会认知等外部支撑条件明显不足。

第一，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制度边界尚不清晰，差异化的政策支撑体系缺失（刘振天和张蕊，2022）。当前国家层面虽然在顶层设计中将高等教育划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但落地到具体的专业目录设置、绩效拨款机制、办学评估指标等环节，仍然没有形成针对应用型本科的专属差异化标准（陈先哲和彭昕红，2025）。多数情况下，应用型本科的评估考核仍然参照学术型高校的相关指标体系，迫使院校不得不把大量资源向学术研究倾斜，无暇投入复合式培养体系的建设。部分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甚至直接把应用型本科的科研成果产出数量作为核心排名指标，进一步倒逼院校走同质化的学术偏向路线，丧失自身的办学特色。

第二，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缺位，产业端参与复合式培养的激励严重不足。当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主管单位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人社、工信、财政、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常态化的协同会商机制，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之间缺乏衔接配套。最典型的是，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本无法得到合理补偿，承担学生岗位实践任务无法获得税费减免、项目倾斜等实质性的政策激励，反而要投入大量人力带教学生，甚至要承担实习安全管理的额外风险，导致企业参与复合式培养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往往将校企合作视作应付检查的负担，而非协同育人的利益共同体。调研显示，仅有不到10%的参与调研的合作企业表示曾经获得过政府发放的产教融合专项补贴，绝大多数企业的带教成本完全由自身承担。

第三，传统学历偏见的社会认知惯性强大，复合型人才的价值分配规则尚未建立。长期以来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价值导向仍然占据主流，社会资源分配、职称晋升、薪资待遇体系仍以纯学术学历作为核心标尺，复合型人才的工艺创新、实操贡献难以获得对等的社会价值认可。这种认知惯性不仅导致家长和学生报考时优先选择传统学术型专业，即便进入应用型本科也普遍将考研升学作为第一目标，不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参与实践能力训练，也导致复合型人才的薪资待遇与其实际贡献不匹配，加剧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与学生不愿投入复合能力培养的恶性循环。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资历、学分与证书互认的制度性壁垒尚未打通，制约了复合型人才的跨境认证与流动。作为“一国两制”框架下三地教育制度交汇的特殊场域，大湾区应用型本科高校推进复合式培养，既有先行优势，也面临其他区域没有的特殊制度壁垒，困境既来自境内制度供给不足，也叠加了三地教育制度差异带来的特殊障碍。政策供给层面，大湾区职业教育交流互认缺乏

专门针对性政策框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虽提出推动教育合作发展,但区域协同、差异化解、学历互认等方面具体政策指引不足。高等教育衔接层面,大湾区虽已初步形成高等教育集群架构,但层次类型转换和学分互认仍存在障碍,三地学分互认仍处于探索阶段。政府协同层面,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合作时间较长,但合作形式单一,尚未成立职业教育跨境协调机构。这些制度壁垒导致大湾区应用型本科高校推进复合式培养、对接港澳职业资格标准时,面临“标准不通、学分不认、证书不互”的困境,降低了三地复合能力流动效率,是大湾区应用型本科复合式培养体系建设亟需破解的区域性特殊课题。

四、以复合式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性重构路径

针对当前实践中的突出困境,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必须跳出局部环节调整的碎片化思路,以复合式培养为核心进行全链条的系统性制度创新,从分类定位治理框架、三位一体标准认证体系、“课程—实践—研究”一体化教学、长周期岗位实践机制、协同治理生态五大维度协同发力,全面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范式转型。

(一) 重构分类定位与治理框架,确立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制度边界与战略使命

要从高等教育顶层治理体系层面明确应用型本科的专属身份定位,彻底破解普教逻辑的路径依赖,为复合式培养扫清制度障碍。

第一,在高等教育分类管理中单列应用型本科(含行业特色院校)独立板块。国家层面牵头修订本科专业目录和高校类型认定标准,形成与学术研究型、技能型高校完全差异化的权责清单、资源配置规则与质量评价要求,完全摒弃将学术型高校的评估指标套用到应用型本科的传统做法。在绩效拨款机制设计上,将产教融合成效、复合人才就业质量、企业技术服务贡献等作为核心拨款依据,大幅提升复合式培养相关指标的权重,从资源导向上引导院校主动向复合式培养方向转型。

第二,以国家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集群为牵引发布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路线图与试点名录。聚焦现代农业、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现代公共服务等复合人才缺口最突出的重点产业领域,遴选一批行业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成体系的复合式培养先行试点,建立部—省—校三级协同的年度评估与动态扩面机制,对试点院校下放更多的专业设置自主权、教学改革自主权,支持其率先突破传统育人模式的制度桎梏。

第三,建立差异化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推动试点院校全面重构内部绩效考核、职称评审制度,设立独立的复合教学型、技术服务型职称评审通道,将教师指导学生参与产业项目、为企业提供工

艺改良服务的成果，与纵向课题、核心论文赋予完全对等的评审权重，把五年以上行业一线工作经历作为新进工科、应用型文科专业教师的硬性准入条件，从根本上引导教师将精力投入到复合式育人环节中。

（二）建立“学习成果—能力框架—行业标准”三位一体的国家标准与认证体系

以统一的标准体系作为复合式培养的制度底盘，彻底打通“知识—能力—认证”的联动链条，确保复合式培养的规范性与含金量。

第一，制定国家级应用型本科复合式培养通用国家标准。由教育部联合各行业协会、头部企业共同参与，发布覆盖知识储备、方法素养、数智能力、职业伦理、岗位胜任力五大维度的学习成果框架，将每一个专业的毕业要求细化为可量化、可检验的复合能力指标，明确写清楚该专业学生毕业能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水平。推动专业培养标准与人社部门发布的职业（岗位）能力标准逐项对表，确保人才培养要求完全贴合产业端的实际需求，从标准源头上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

第二，完善专业与课程双认证机制。授权独立第三方（包含行业头部企业、行业组织）参与复合式培养质量的认证与抽查工作，建立“标准制定—过程认证—问题整改—动态复评”的闭环动态退出制度，对复合式培养流于形式、实际培养质量不达标专业直接暂停招生资格，彻底杜绝换汤不换药的形式化改革。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学分映射规则，将职业技能证书对应的考核内容与校内课程体系进行一一对应，明确学生获取相关等级技能证书后可以直接认定对应课程的学分，支持学生免修相关理论课程，把节省出来的时间投入到实践项目训练中。

第三，搭建全国统一的复合能力学分银行系统。将学生的课程学习成果、项目实践经历、技能等级证书、企业评价记录全部转化为可累计的复合能力学分，学分不仅可以跨校互认，还可以作为学生升学、求职、职称评定的统一能力证明，实现不同学习经历的成果等效认定，彻底打破学历与职业能力之间的制度壁垒。

（三）推进“课程—实践—研究”一体化的教学重构，形成以真实情境为载体的学习组织

对传统以课堂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进行彻底重构，将真实产业场景项目作为复合能力培育的核心载体，实现课程学习、实践训练、研究探索深度融合。

第一，设定情境化、项目化学习的学分底线要求。所有应用型本科专业明确跨学科工作坊学习、联合毕业设计、企业真实项目实践的最低学分占比，硬性要求实践类、项目类学分占总学分比重不低于40%，推动课堂从讲授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鼓励教师将产业真实难题、现实问题转化为教学案

例与课程项目,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全流程训练,在解决真实问题过程中完成跨学科知识内化与复合能力升级。

第二,构建“校内教师—企业导师—地方实践导师”三师协同的授课与评价机制。突破传统校内教师单一授课模式,每个复合式培养班级配套行业头部企业一线技术骨干作为企业导师,基层一线人员作为实践导师,共同参与教学全流程。支持高校打破院系边界建立跨学科项目工作室,将真实长期任务引入日常教学,让学生持续参与不同类型真实项目,逐步积累复杂问题解决经验。

第三,重塑应用型本科科研定位,将工艺改良与技术服务作为核心科研方向。摒弃应用型本科盲目追求基础理论原创的误区,将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技术中试、产品试制、工艺改良作为科研核心方向,依托省级专项资金联合龙头企业共建公共工艺创新中心,挂牌为复合式教学实践基地,由专项资金补偿企业开放生产线、核心技术项目的教学成本。要求所有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必须来自企业真实生产难题,由校内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共同指导、共同答辩,从出口环节保障学生复合能力得到充分训练。

（四）制度化长周期岗位实践与工学交替，构建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稳定连接

借鉴德国双元制、新加坡整合式工学交替计划的先进经验,将长周期岗位实践作为复合式培养的核心必修环节,推动校企合作从临时协议关系升级为利益共生共同体。

第一,建立国家级统一的长周期岗位实践标准与岗位资源库。由教育部牵头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接全国重点企业、事业单位与基层治理单元,开发覆盖所有应用型本科专业的合规实践岗位库,明确规定应用型本科学生累计不少于6个月的全脱产岗位实践作为毕业硬性必修要求,实践过程中必须完整参与至少一个真实生产项目的全流程。开发全国统一的数字化实践管理平台,对实践过程记录、成果鉴证、学分认定进行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杜绝实践环节的水实习、虚假盖章等形式主义问题。

第二,出台系统性的激励支撑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内生动力。将企业导师资格认定、校企联合课题立项、产教融合型企业税费减免等支持政策进行打包落地,对承接高质量长周期岗位实践的企业,按照参与学生人数给予对应的财政补贴,在企业评优、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充分弥补企业带教学生产生的额外成本。明确企业可以优先录用参与过本企业实践的毕业生,大幅降低企业的新员工招聘与岗前培训成本,让企业实实在在从复合式人才培养中获得收益,从根本上调动企业深度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探索中国特色的学位学徒制培养模式试点。选取人才需求旺盛的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

等领域，推广英国学位学徒制的成熟经验，学生入学后直接与合作企业签订就业意向协议，学习过程中一半时间在学校完成理论学习，一半时间在企业参与岗位工作，企业按照正式员工的标准为学生发放助学补贴与岗位薪资，学生毕业后直接入职合作企业，完全实现学习与岗位的无缝对接。

（五）完善协同治理与社会认知环境，为复合式培养提供可持续的制度生态

打破教育系统内部的政策闭环，建立跨部门协同的治理体系，从顶层制度设计与社会文化引导两个层面为复合式培养营造良好的外部生态。

第一，建立多部门常态化会商与联合政策发布机制。由教育部门牵头，联合人社、工信、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建立应用型本科复合式培养的年度会商制度，在招聘岗位标准制定、职称评价规则、项目资金支持等方面形成统一的政策协同预期，出台针对应用型本科毕业生的用人平等反歧视指引，明确要求各类企事业单位招聘时不得设置“仅招收学术型高校毕业生”等歧视性条件，提升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的制度接纳度。在职称评审制度改革中明确，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工艺创新成果、一线技术服务贡献可以与学术论文、科研课题同等条件参与职称评审，打通复合型人才的职业上升通道。

第二，实施国家层面的复合式培养品牌塑造工程。系统总结一批行业特色应用型高校推进复合式培养的典型成功经验，打造一批国家复合式人才培养示范群，通过主流媒体进行集中宣传推广，改变社会公众对应用型本科的传统刻板印象。在教师职称评价、学校社会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中，为复合式人才培养相关的工作内容设置明确的加分导向，引导院校、教师主动向复合式培养方向投入资源。

第三，构建“技能光荣、复合成才”的社会文化认同机制。将复合型人才的成长故事、大国工匠的典型经验融入中小学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体系，通过纪录片、公益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引导社会公众逐步打破“唯学历论”的传统认知，形成尊重复合能力、尊重实操贡献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复合式培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厚的社会土壤。

第四，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特殊区域依托现有协同平台，率先破解三地资历互认与复合能力跨境流动机制问题，借鉴已有探索路径推进学历与职业资格互认，扩大粤港澳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试点和“一试多证”职业范围，探索建立大湾区职业资格框架体系，逐步实现三地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融通：一是支持大湾区应用型本科高校依托粤港澳高校联盟等平台，推动三地高校开展学分互认、交换交流、科研成果转化合作，将复合能力学分银行拓展至大湾区跨境范围，实现学分、证书、资历“三通”；二是支持有条件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联合港澳职业教育机构共建跨境特色职教园区，推

进实训基地合作,为学生提供跨境岗位实践与认证场景;三是利用大湾区人才政策红利,支持港澳人才申报省重大人才工程,实现居住在港澳、工作在内地,推动企业导师资格、技术服务成果三地互认,扩大复合式培养师资与产业资源供给半径。

五、研究结论

面向教育强国与“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以复合式培养重构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是回应新质生产力人才需求、破解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推动高等教育分类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跳出“学术/职业”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依托三大理论阐释复合式培养内在逻辑,结合多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一手调研数据,剖析当前改革面临的培养范式路径依赖、评价体系能力割裂、治理机制支撑不足三类现实困境。研究表明,应用型本科高校复合式培养体系建设不能停留在碎片化调整,必须推进覆盖分类定位治理构建、能力认证体系落地、教学模式重构、长周期岗位实践制度化、跨部门协同生态培育的全链条制度创新,配套完善多层面保障机制,才能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性升级。

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的全面建成,将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彻底走出同质化竞争的发展误区,形成与研究型大学、技能型高校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格局,源源不断向区域产业体系输送兼具跨学科理论素养与复合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院校实践样本。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聚焦不同行业特色的应用型高校复合式培养的差异化模式开展细化研究,构建更加精准的分领域复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我国应用型本科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2): 109-123.
- [2]Spady, W. G.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A Bandwagon in Search of a Definition[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77, 6(1): 9-14.
- [3]别敦荣. 学术本科、应用本科和职业本科概念释义、办学特点与教育要求[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8): 61-68.
- [4]陈先哲, 彭昕红. "汇合"还是"分流": 教育体系优化进程中的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J]. 中国高教研究, 2025(2): 75-82.
- [5]刘振天, 张蕊. 我国高等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历史演变、逻辑特征及前景展望[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22, 32(2): 142-149.

[6]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特色和质量[J]. 中国大学教学, 2005(12): 4-6.

[7]陶莉, 张家飞, 郝明东. 融合职业与高等教育: 英国学位学徒制改革举措与实施成效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24(22): 75-82.

[8]温格. 实践共同体: 学习、意义与身份[M]. 边国英,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

[9]徐理勤, 王兆义.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双元制培养模式的内涵特征与动因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 (5): 71-78.

[10]智联招聘. 2024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R]. 2024.

[11]中共中央, 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 [Z]. 2025.

[12]中共中央, 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Z]. 2019.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Z]. 2026.